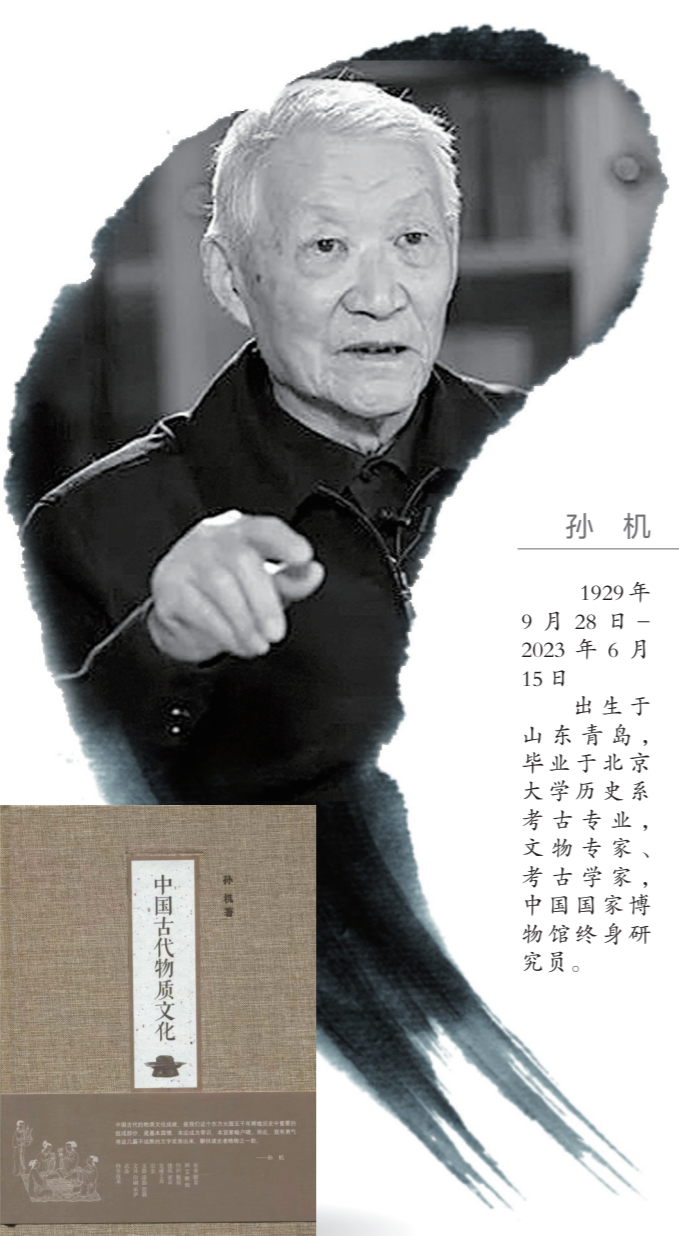


追忆

本报特组专版，以志纪念——
家孙机、文学史家杨义相继远行，留下无尽哀思。
夏雨时节，哲人其萎。本周，画家黄永玉、文物学

孙机：师从沈从文，一生爱“较真”

□宋彦



让现代人看到古人的智慧

1950年代初，孙机开始和沈从文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从此进了考古学、文物学的门。他的一生都在和文物、古籍打交道，在断代研究、中国古代服装研究、文物鉴定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著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仰观集》等著作。

去年，在孙机93岁高龄时，一段采访视频让他登上了热搜。“做研究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做这门学问”，孙机面对镜头，话语掷地有声。他一生爱“较真”，曾多次为国宝正名，深入研究中国文物和文化，厘清了很多被误解、讹传的古代文化常识。

“在古代，做一个中国人要比做一个外国人舒服得多。”记得当年采访孙老时，聊起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已过耄耋之年的他总有说不完的话。

作为国内极有影响的文物专家和考古学家，孙机把“认识过去不认识的东西”视作自己的使命。在多数人都把学习西方技术、文化和生活方式视为时尚时，孙机转过头，把古人的生活和生产作为研究对象，辨认残缺的古物，支离破碎的“老东西”中窥探古人的生活方式。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孙机就跟随沈从文学习中国古代服饰

史。当时，他是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的技术工人，沈先生的办公室就在他的隔壁，近水楼台，沈从文成了孙机走进考古领域的引路人。

被名师带入门后，孙机又考进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在学校，他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和书中的“老东西”打交道，渐渐摸索出一套用文献与实物对照，再互相印证的研究方法。

“除了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有好多比西方先进的发明，比如马镫、船舵、纺车、织布机……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在历史上我们固然也学西方的东西，比如马镫铁等，但总的来说，在生活方面，中国比西方先进，这是我们的优势项目。”

让中国人看到自己的文化魅力，看到古代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成就，这或许是孙机写就《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的原因。

在孙机心中，辨认出一尊茶神陆羽像不值得骄傲，从这尊小小的神像中看到的古人与茶的关系才更值得玩味。从农业膳食、纺织服饰到建筑家具，再到流传至今却鲜有人关注的古代科学技术，孙机要掸去蒙在古物上的泥土和尘埃，让现代人从这些遗物中看到古人的智慧和哲学。

古代的“中国制造”不只是筷子

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对物质的梳理中，以汉朝最为详尽。孙

机对汉代的物质文化最在行，过去的二三十年，他几乎阅读了汉代的所有文献资料，看遍了出土文物，从耕作工具到宫廷贵器，从一盏茶杯背后的文化生活，到一只酒杯所透露的等级差异。

孙机正是从这些细微之处着手，从一个朝代的物质生活中看到了人与物彼此依赖又互相成就的密切关系。

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很多常识性的错误被孙机纠正。比如，“床前明月光”里的床并非睡床，也不是被广为认可的胡床，而是一种坐具，类似沙发，常被安置在厅堂的两根檐柱之间。

“他看到的是床前即堂前地面上的月光。”孙机说，现代人对古代物质生活没有最基本的认知，很多古诗词中的意象是被曲解的。

物质与文化总是相伴而生，这甚至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没法完全说清楚。就像“床前明月光”中的“床”，它在中古时还是贴地的坐具，“跪坐”是礼仪与高贵的象征。随着床腿的增高，中国人的起居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垂足坐也随着佛教的传入开始盛行，于是有了今天的椅子和沙发。

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同样博大精深。精于油炸煎炒让我们拿起了筷子，当时，西方宫廷还在用手抓食物。

孙机算了笔账：“现在拿筷子吃饭的，除了中、日、韩、朝、越、新加坡的十六亿人外，还有海外华人

五千万人，以及十六万家餐馆；加在一起，每天在餐桌上大约会举起十七亿双筷子。中国筷子的影响面之大可以想象。”

孙机在书中提及，“中国制造”闻名于世的不仅仅是筷子。西方的冶金工业比中国晚一千多年。中国人三四千年前就学会用大豆制作酱油，欧美人却在1873年之后才吃大豆这种粮食。当古罗马人还把缰绳拴在马脖子上时，中国人早已掌握驾驭马车的技巧——与其让马窒息而亡，不如靠大腿和前胸出力。

古代中国是尚礼的社会，很多物质为“礼”而生。因此有了精致的祭祀礼仪，有了礼乐，有了繁复的穿戴礼仪。有了“礼”的约束，中国人不喜欢西班牙式血腥的斗牛，不像古罗马人热衷于在角斗场疯狂。古代中国人的业余喜好是温和而精致的。他们喜好斗茶，因而创造了花样繁多的泡茶方式和茶壶茶杯。

“古代中国的物质发展是独立的，也是先进于世界的。几千年里，中国的社会是稳定的，朝代的更迭没有断了文化和生产。”孙机说，即便是唐朝300年，外来使节不断，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他认为，从古至今，为活得更好而创造，是不变的发展动力。只是，古代中国人更幸运，他们拥有一片富饶的土地，一段稳定又足够漫长的历史，物质在时光中发酵，造就了不朽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杨义：以“三通”绘制中华民族的文化地图

□刘跃进



从古今贯通到激活先秦诸子智慧

杨义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充满理想，积极开拓，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追求中，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楚辞诗学》《李杜诗学》《读书的启示》《文学地理学论集》以及《杨义文存》、《先秦诸子还原系列》等60余种图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0余篇。主编《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顾毓琇全集》《中国史经典讲堂》等书籍19种，逐渐实现自己“从古今贯通到激活先秦诸子智慧”的梦想。

总结杨义先生的学术理想，可以用“三通”概括而言之，即古今文学的贯通、中华文学的融通、中外文学的互通。

杨义，1946年生，广东电白人。1965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1970年分配到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工作，工人、宣传干事。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在唐钊、王士菁等先生的指导下，以鲁迅为研究对象，撰写了二十多万字的硕士论文。1998年在香港推出《鲁迅作品精华》。担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后，杨义对该书所有点评进行脱胎换骨的修订和深

化，点评的篇幅，由原来的三四万字拓展为近20万字，201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还原真实的鲁迅，揭示了鲁迅思想和文学的精髓。此外，还有《鲁迅文化血脉还原》等作品。

1981年8月，杨义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当助理研究员，1985年任副研究员，1989年任研究员。在这十年间，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为此阅读了两千多种小说。下了十年苦功，最终完成150多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著作成为了杨义先生的成名作。

在这以后，杨义先生试图突破古今文学研究分家、“隔行如隔山”的模式，开始研究并写作《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等。他认为中国古典学若不及诗骚词曲，可能会顿失精神，因而在研究古代小说史之后，杨义先生又转入古代诗学领域，陆续写成《楚辞诗学》《李杜诗学》。

学术兴趣永远在变化中

杨义先生曾说：“我本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幅文化地图是对汉族文学、50多个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关关系，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的。”1998年底，杨义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他还担任《文学评论》《文学年鉴》主编，全国《格萨（斯）尔》领导小组组长，2006年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这就为实现他的梦想，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在《风卷红旗过大关——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论文选序》中，杨义先生自豪地指出：“把诸多民族和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纳入中国多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总格局，探讨其丰富多彩的成就和相互关系，探讨其中心的凝聚力、辐射力和‘边缘的活力’，探讨其融合成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历程。包括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壮族、哈萨克族、彝族、傣族在内的各民族，都第一次写出自己的专门文学史。尤其是史诗学和各民族文学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国是史学贫国’的不明家底的

缺陷。”

2010年4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近代公共媒体与澳门、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经验国际学术研讨会”，杨义先生提交的论文是《西学东渐四百年祭》。他从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之死，说到《四库全书》，讨论了四百年中西文化的碰撞、互渗、选择和融合的过程。

此后，他任教于澳门大学，在潜心研究之余，不时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讲学，从本质、内涵、方法上探讨文学地理学的基本问题，并在众多领域，涵盖中国多元的地域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来四百年的西学东渐过程，中韩日相互影响的东亚文化，以及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老子、庄子、屈原，到唐代的李白、杜甫，直到近代的鲁迅、沈从文等一系列思想家、文学家的典型个案，进行深度的文学地理学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原创性见解，在诸多领域丰富了学术史和文学史的叙述。

回顾杨义先生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工作，不论是古今文学的贯通、中华文学的融通，还是中外文学的互通，他的学术兴趣永远在变化中，没有丝毫守成的意思。他在总结《文学评论》创刊60年的历史经验时说，60年的落脚点是开拓，这又何尝不是他的特点呢？

访谈

“黄永玉教我用幽默和爱去看世界”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孙磊



黄永玉先生去世后，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美协副主席许鸿飞，他是黄老生前交往较多的朋友——

“要学会忍耐和等待”

羊城晚报：您最后一次见到黄永玉先生是什么时候？

许鸿飞：2021年全国文代会召开的时候。我去他家里，把自己的一些作品照片拿给他看，他说做得好。我问他忙什么，他说在准备100岁作品展，画了一批“新货”，同行都没看过的。他说，办展览一定是新作品，不能倚老卖老。我一听：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羊城晚报：您是什么时候认识黄老的？

许鸿飞：1999年。他通过林铺先生的介绍第一次来我的工作室，好像林蓝也来了。在我旧的石磨坊工厂里，他无意中看到我的一件“肥女”系列作品《秋》，让我卖给他。我说不卖。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很厉害，而且我也找不到创作方向，不知道做什么好，只是在做工程，但那种还不能叫艺术。第二年，他从意大利回来，又来我的工作室，拿了一个烟斗送给我，教我抽烟斗，因为之前我抽的是香烟。他问我那个作品还有没有？我说有。他说卖给他，我说送给他。他

说不行，那么贵重，他给我画一幅八平尺《荷花》，白描的。

羊城晚报：慢慢地交往多起来了？

许鸿飞：后来，他叫我去北京找他，住在他家里。他教我很多东西，比如，艺术家一定要有自己东西，要跳出学院的那一套。每天就这样跟我聊：你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要用幽默的眼光看世界，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做成你的作品；有希望、快乐、幽默，就是戏剧性的。

我回到广州就开始按照他说的做，这才感觉到原来他那么厉害，当时我才三十几岁，而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下星期要来广州找我，我一听就紧张了，因为很多作品都没做。这样，我就起早贪黑做了一些，他来了，叫我把我作品一件一件打开，说这个不够大胆、那个不够夸张，要如何构图、造型，应该注意哪些细节，有些该放的，要随意。比如，《飞车》那张，之前肥女飞起来的腿是平的，手也是平的，他说不行，腿一定要错开，后来把一条腿压下去，一条腿抬高，就很生动了。又说，做人的雕塑的时候，要抓住他的五官的大体，双眼皮这些不重要，有时候眼睛一条缝就行了，但你要有外形的那种造型，肉感的凹凸，棱角、钝角的线条，要抓住这些。他跟我说话的时候，都是用粤语的。

这些都是我以前没听过的，每

次见面我们都在说，都在交流，然后我不停地创作。其实，我之前的作品是为了做给他看的，而不是为了参加展览。所以，我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认识了他，他教我用幽默和爱去看这个世界。

有一次，他突然说，一下子80岁了，像做梦一样，如果让我60岁多好，哪怕70岁！因为他有很多想法，很多东西想表达，但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他也跟我说，我们要学会忍耐和等待，时间决定一切。

他会亲自下厨做红烧肉

羊城晚报：您怎么定义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许鸿飞：亦师亦友。

羊城晚报：您觉得为什么他会选择您做他的朋友？

许鸿飞：可能是我的生活态度、兴趣，比较随意。他曾经说过我是他在广州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昨晚还做梦，跟他聊了许久，那么开心，后来醒了……突然间，接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羊城晚报：黄老的画在市场价格很高，但他为您创作了不少件。

许鸿飞：有数十件吧，很多都是在我工作室里，为我画的，有很多故事。有些题跋还是用广州话写的。

羊城晚报：您怎么评价他的艺术成就？

许鸿飞：在我心目中，他的地位肯定是最高的。

羊城晚报：为什么？

许鸿飞：他对艺术包括对生活的态度是很好的。

羊城晚报：从美术创作本身来说，您觉得他超出一般画家之上的关键是什么？

许鸿飞：他是中西结合，这跟他到全世界各地游历有关，视野开阔，格局大，天赋聪颖，机智幽默。

羊城晚报：他经常来广州，您会陪他去哪些地方走走吗？

许鸿飞：上下九、淘金路，哪里咖啡好，他就去哪里。他喜欢喝咖啡，也喜欢时尚。他很平易近人，连很多服务员都认识他。他也会去菜市场买菜，喜欢做红烧肉，自己亲自下厨。

羊城晚报：他喜欢粤菜？

许鸿飞：喜欢，我经常带他去炳胜吃饭，他喜欢赞美好的事物，赞美食、艺术。他是比较包容的，不会看不起同行。这就是他的优点，包容，他也不停地在学、在记。他跟我说过，如果你看不起新事物，证明你已经老了，证明你已经没救了。

羊城晚报：他的夫人是广东人？

许鸿飞：对，新会的。所以，他会说广州话，还会很多方言，闽南话、上海话也会。他喜欢广东，也许是他感觉广东是一个比较生活化、“不装”的地方，比较接地气，可以穿着拖鞋去喝茶也无所谓。